

赤堀英三著：《中國原人雜考》，日本，六興出版，1981年7月，共379頁；八幡一郎跋，圖版，8,500日元。

本書作者赤堀英三1903年出生於日本群馬縣。東京大學理學部地質學科畢業後，轉往京都大學隨足立文太郎學習比較解剖學和體質人類學。1938年，受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遣送往中國，曾與江上波夫等於內蒙古一帶作考古調查。赤堀在北京期間，得以遊學於當時中外學術巨擘如李四光、裴文中、德日進、桑志華、安特生和魏敦瑞等之間，集思廣益。1949年後，赤堀還常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學術交流。《中國原人雜考》一書是他數十年來中國舊石器時代研究的總結。書中對中國舊石器文化作了全面性的檢討，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本書的面世，對於中國舊石器時代的研究，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於本書評受篇幅的限制，筆者只能主觀地選擇以下四則簡單介紹。其它未及介紹的如札賽諾爾、大荔和百靈廟的人骨研究、李四光和魏敦瑞的紀念文章以及內蒙古考古調查日記等，有待讀者自己去細心閱讀。

(一) 北京猿人洞內長期居住說質疑。

赤堀接受步達生的猿人洞堆積上下層文化和動物均安定說、魏敦瑞的猿人洞堆積上下層出土猿人化石屬於同一類型說、李四光的猿人洞內發現不是原生而是經過沖洗的泥礫說作理論的根據，再進一步推測猿人洞堆積的形成是：猿人洞的文化堆積層可能是在大姑——廬山間冰期一段比較短暫的期間內，從洞外混雜遺物的堆積物，流入猿人洞中充填了部分較大的裂隙。因此，人骨與遺物的發現地點，與當時人類實際的生活空間，二者不可以等同處理。此外，由於猿人洞的地勢傾斜，中更新世中期的堆積填充後，再經過一段期間（中更新世晚期），猿人洞上又再出現若干大小的裂隙。稍後，屬於晚更新世早期混雜有遺物（精緻小型石器）的堆積物，再流入洞內裂隙裏。估計只要裂隙的深度愈大，精緻的小型石器便可能達到洞內比較深入的位置。如此一來，運用一般地層學的原則，下層比上層堆積年代古老的說法，對研究猿人洞的堆積物來說，必然會引起較多的混亂。赤堀強調北京猿人並不在所謂猿人洞中生活，而可能是溫帶森林草原洞外的居住者。

(二) 華北早期更新世文化年代質疑。

在《西候度》報告書中所提及的三個論點是：

〈1〉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全屬於泥河灣層的滅絕種屬，年代是早期更新世；



〈2〉同層出土的石器已具備型的特徵，可以作一定的分類；

〈3〉化石羣與石器是同時期的遺物。

由於《西候度》報告書裏對遺物出土的狀況，並沒有詳細的報告，讀者難於判斷以上的見解是否正確。赤崛却認為，西候度遺址的情況可能是早更新世動物化石與中更新世的石器羣的混雜。據說這個見解後來獲得部分學者的支持。在周明鎮訪問日本期間，對西候度遺址發表了與赤崛大致相同的看法（原書頁83）。

此外，赤崛更指出，目前一般被認為是屬於早更新世時期的小長梁遺址的堆積情況，可能與西候度遺址相似，有待進一步慎重的考察。

### （三）許家窑遺址文化質疑

對於許家窑文化作為北京猿人文化與峙峪文化之間的過渡橋樑一說，赤崛作了詳細的討論。

〈1〉許家窑遺址的位置相當於桑乾河的第二段階地，屬於晚更新世的地層。

〈2〉許家窑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與峙峪和大溝灣遺址出土者相近。如果僅根據許家窑遺址曾出土裴氏轉角羚羊（*Spirocerus peii*），是難以判斷遺址的年代屬於中更新世晚期的。

〈3〉根據石器的分類統計，小型石器佔70%，粗大石器佔30%。這樣報告書中所謂：「粗大的石器非常少見，幾乎都是細小的石器」的描述，是不準確的。

要之，赤崛以為從北京人文化經許家窑文化到峙峪文化三者發展的連續性是不能成立的。許家窑和峙峪遺址出土的遺物年代相約，可能是相互影響的。

### （四）渭汾文化圈假說

赤崛的渭汾文化圈假說靈感來自李四光汾渭地塹的學說。這個文化圈由「藍田期」、「匭河期」和「丁村期」等文化組成，各代表了同一系統裏不同時期的異相。渭汾文化的三種特徵性的石器（指標石器）是a. 三稜大尖狀器、b. 石球和c. 兩面砍砸器（Chopping-tool）。這三種石器的結合表現了渭汾文化圈的獨特性。赤崛更推論，由於石球和三稜大尖狀器的使用痕不明瞭，可能不是實用性的器具。

上文對《中國原人雜考》一書，作了扼要的介紹。前述第一至三項是作者就中國舊石器時代研究諸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第四項是試圖為中國早、中期舊石器文化建立新的體系。以下談談筆者個人讀後的幾點感受。

第一：近年來，國內不少的學者，都傾向於贊成北京猿人曾經在猿人洞裏長期居住，時間長達二、三十萬年之久的說法。1985年南京大學地理系所發表的《周口店洞穴發育及其與古人類生活的關係》一文中，從猿人洞充填發展過程，把猿人在洞中生活歷史劃分為幾個階段來介紹。然而，對以上的意見國外學者持相反論點的也不少。除了赤崛從洞穴堆積學的角度，強烈反對北京猿人曾長期於洞內居住說外，另一個值得注意是賓福特（L. R. Binford）於1981年在 *Bones* 一書中（Academic Press）所提

出的意見。他把周口店洞穴內發現的動物化石與猿人間的生態關係，作了初步的探討。1985年，賓福特和何傳坤再從堆積學、動物行為學、狩獵行為學、遺物與動物化石的空間分佈、骨的破裂形態等諸角度，重新分析估計了猿人洞內動物化石堆積的成因和猿人的行為和本質等問題（*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6. No. 4, 1985）。他們推論中國鬣狗和狼等食肉獸可能長時期間從洞外把中小型的動物遺骸甚至猿人的屍首，帶進洞穴食用。中國猿人V號頭骨上，遺留着被食肉獸咬過的齒印。此外，從遺址發現的猿人頭骨，一般面骨的部分都是完全殘缺的。其中原因除了與面骨結構比較脆弱，稍受壓力即容易破碎外，也可能與食肉獸咬碎獵物的面骨，再吃掉頭骨內軟組織的食性習慣有關。因此，食肉獸動物行為對所謂猿人洞內的猿人和其它動物化石的存在方式，可能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

對於北京猿人是否長期穴居的問題，筆者是傾向於國外學者的說法。理由之一，正如賓福特所指出，洞穴內所發現的灰燼層，並不能證明是爐址的遺跡。此外，洞內雖然集中出土了不少的石英石器，但並不保證這些石器沒有受搬運後再次堆積的可能性。如果只是說洞外陽光可以射進洞穴中，洞內有石器、灰燼層、猿人和動物化石等，都不能證明北京猿人曾於洞中長期生活的事實。今後國內學者如果仍要主張北京猿人在洞穴內長期生活的假說，是有必需對洞穴內是否存在着猿人的生活面(sol d'habitat 或 living floor) 遺跡，作清楚的交代。在西歐考古學界，對舊石器時代生活面系統的研究，也是40年代以後才漸漸發展的。經50和60年代原位置平面發掘技術的改良，才有了較大的進步。我國今後如果在這方面努力發展，對舊石器文化研究肯定會有重大的推進。

第二：1979年部分中國的考古學者就許家窑遺址的年代問題，發表了100,000年的估計。這和赤崗的推測，相差了六、七萬年之多。以下筆者從許家窑遺址出土石器的特徵談起。1984年春筆者在北京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李超榮先生的研究室內，參觀過許家窑遺址若干的石器。觀察所得的感受有二：

〈1〉許家窑遺址出土的石器，除存在着比較大型的砍砸器和石球外，其他較大型的尖狀器和刮削器亦不少。這些石器的素材一般以礫石粗割後加工，原來的主破裂面常被保留。以上的觀察，和日本明治大學安藤政雄在〈中國の石器〉（《駿史台學》，Vol. 55, 1982）文中發表的意見，大致上是吻合的。

〈2〉許家窑遺址石器類型中，存在着不少石葉石核、石葉(Blade)和石葉製成的石器工具。石葉的生產技術包括了石葉石核台面的修整和石葉頭部修整的技術。生產的石葉修長而美觀，推想頗為成熟的石葉生產技術已經存在。（圖1）

有關世界各地石葉技術出現的較早年代，據筆者所知，南菲Klasies河流域遺址發現過40,000年到50,000年前左右較早的石葉工藝遺物；歐洲一般是33,000年前左右；近東地區可能是60,000年前，到了35,000年左右有了比較成熟的發展（precocious appearance of blade technology）；在東亞，西伯利亞是30,000到25,000年之間；日

本是32,000年以後。中國方面，筆者估計是40,000到30,000年期間，才開始出現比較成熟的石葉技術。這些資料和許家窑遺址石器的對比，是有一定參考作用的。

第三：有關赤崁的渭汾文化圈假說是否能夠成立的問題，筆者以下就指標石器和方法論兩者去討論。

### (1) 指標石器

赤崁所謂渭汾文化的三種指標石器是兩面砍砸器、石球和三稜大尖狀器。其中兩面砍砸器在各地石器時代裏都存在的。所以根本不可以作為指標石器的資料。至於石球，在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遺址裏也有大量的出土。赤崁謂因為看不出中國的石球有使用的痕迹，所以推測這些石球是非實用性的工藝品。這個觀點無疑是可以商榷的。實際上，目前我們都不真正明白這些石球是如何使用的，這樣當然談不上對這些石球上的使用痕的鑑定。還有是三稜大尖狀器，這種石器自被命名以來，由於缺乏明確的定義，近年來已備受世界各地舊石器考古學者所批評。赤崁曾把藍田猿人遺址的三稜大尖狀器（手斧）與韓國全谷里遺址的手斧相比較。這樣的比較是很有問題的。從全谷里遺址裏發現典型的手斧只有五個，砍砸器卻有八十五個之多。其他報告書中發表的手斧大都是表採搜集的。1985年12月筆者承韓國考古學會的邀請，與建國大學崔茂藏在全谷里遺址調查之際，曾表採過一件片面磨光的石斧。因此，全谷里遺址表採所得的遺物，年代可能下延得很晚。最近部分考古學者把全谷里遺址出土石器的文化層，訂作中期舊石器時代。筆者也認為全谷里遺址的年代，應再作審慎的推敲。所以，把中國早期舊石器時代的藍田遺址和韓國中期舊石器時代的全谷里遺址的石器相互對比，是有一定困難的。

### (2) 渭汾文化系統方法論

有關赤崁的渭汾文化中，藍田期、匭河期、丁村期的系統分析法，不外是採用了法國1900到1950年代傳統學派的方法論。這個學派重視指標化石、石器和以生物學種族系統觀念來分析舊石器的遺物。近年來，這種方法論在歐美考古學界裏，已受到極為猛烈的批評。考古學者對舊石器的研究，雖然已經歷了100多年以上。然而目前我們對於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傳統和個人癖好兩者在石器製作上，究竟有多少可以被分辨出來的問題，仍然是茫無頭緒。更且，石器在當時的綜合工藝系統、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中，究竟佔着什麼的位置？目前對這個問題所知同樣是一鱗半爪。在這樣的前提下，舊石器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史前石器社會（Lithic Society）的文化系統，當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慶幸近年來，舊石器時代研究方法論上有了不少的突破。科學鑑定的方法如 Kullenberg Coreri 法從深海中抽取出更為完整更新世的氣候變動資料，發現更多冰期與間冰期氣候動盪，比過去四大冰期 Günz, Mindel, Riss, Würm 的 Alpine Model 要複雜和正確得多。其次，生態社會經濟學觀念分析舊石器時代人類作為生物界一員的實際生活，有了更深切的認識，例如赤崁在本書（頁140）所指出藍田系文化圈的獵人對古象的狩獵說法，目前是難以成立的。因為正式的狩獵行為出現的年代是相當晚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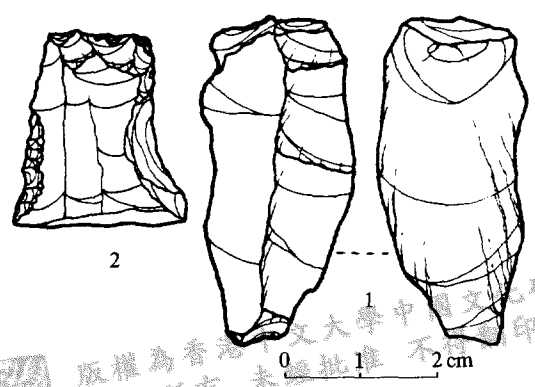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猿人時代如何狩獵還是很大的疑問。現在我們一般相信早期人類可能是食腐動物者 ( Scavenger ) 而不是真正的獵人 ( Hunter )。近年來，在美國 L. R. Binford、C. K. Brain、R. Potts、A. Hill、G. Isaac、D. K. Grayson、A. K. Behrensmeier、D. P. Gifford 等從生態動物學和埋藏學等對史前人類的行為，有不少精彩的分析。我們可以期待在今後的十年內，對於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的真相，在認識上會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鄧聰

一九八六年五月完稿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1 許家窑遺址出土石器

( 1 ) 石葉 ( 2 ) 刮削器 ( 石葉素材、一端截斷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